



河源民间歌曲集

徐东蔚题



程建民 陈勋华 编

整理河源民间歌曲
开发东江客家文化

書題《河源民間歌曲》

張凱一九九七年仲



山歌不山源
远流长出中
原

客家不客扎
根屹南关
中华

杨华维

祝賀《河源民間歌曲集》出版

挖掘客家文化遺產
再現客家文化風采

李秀源

东江客家文化的承传和重建

——《河源民间歌曲集》序

·黄建中·

在祖国的名川巨流中，东江，还不是一条最著名的河流，然而作为东江的儿女，我们与她有着化不开的情愫。每当我们注视东江的一江碧波之际，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总是泛起一种永恒的崇高感和壮美感，升腾出一种充满乡恋的亲切感和自豪感。

我们世代沐浴在东江的巨大恩泽之中。不必急于掸去历史的尘埃，在厚厚的史册中寻找东江的贡献与辉煌，只要稍稍回眸一下这些年头，我们就会发现，东江两岸风调雨顺，农业连年丰收，莫不是受惠于东江的膏泽；工业勃兴，城市发展，也不乏东江的襄助之力；就连香港这颗光耀全球的明珠，亦离不开东江碧水的滋润。东江，是我们的养育之母！

河是文明最伟大的母体，地球上最古老的文明体系都是依傍着同样著名的河流水系建立的。滔滔波浪，片片帆影，袅袅渔歌，东江展示着她那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和伟大母性，也令我们想起了本土文化的起源和衍生。东江之水滔兮，自南越王赵佗率兵驻足于此，积累厚重的中原文化与粗砺质朴的土著文化便开始了历史性的相遇，经历了多少

的碰撞、交融和嬗变，而神交气合，犹如东江的浸润漫染一样，滋生出独具风采的东江客家文化。东江积淀的浩浩之文化灵气，早已经演变和升华成一种人文精神，一种带有遗传信号的人文精神，流淌在东江客家人的血脉里。正由于东江与本土文化的这层亲缘关系，我们对东江又多了一份景仰和虔敬！

河源市地处东江中上游，拥有东江流域近一半的面积，故说东江不能不说到河源，说东江客家文化，撇开河源也是不可想象的。作为地域文化，河源的东江客家文化无疑是华夏文化空间众多组合中的一种，她有着大致的疆域界限，有着由“基于共同历史背景的一种共同传统及特有心灵沟通感所连接起来的一个社会群体”，也就是说，她是东江水土和河源人“人地合一”的产物。河源的东江客家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本土文化，她源于中原，成于斯地，创于斯民，并在悠久的历史的沉淀中得以保留，成为河源人乃至所有东江儿女引以为自豪的极其珍贵的文化瑰宝。

同为客家人，同为东江客家文化，河源的本土文化既有地域文化的共生特质和色彩，也有自己鲜明的与众不同的特点。泱泱之东江大河，莽莽之山区环境，铸成了河源的东江客家文化兼备河流型文化与高山型文化的特征。作为河流型文化，她具有开放的活力，奔放的主流，和吸纳百涓的容量，易于吸收、融解异质文化，使之成为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一部分。作为高山型文化，她具有开放与保守参半的性质，文化结构稳定，其自身的凝固力既利于保持文化的原质和特色，却又不可避免地带有封闭性、静滞性，甚至显示了一定的历史惰性。正因为如此，圆融与超越，充满了希望也

充满了艰辛。

客家文化星光灿烂。然而星光之下，我们曾经有过无名的失落与尴尬。众所周知，粤、闽、赣三角边区是我国最大的一个客家文化圈，可是论及名气，梅江流域以客人南迁主要集散地、客家方言的统一、“清纯”和文化资源的开发而被拥称“客都”，汀江流域以客家民系的祖居地及其土楼民居这种深远而光辉的历史和独特的人文景观而大放异彩，而我们却常常自觉不自觉地陷于客家文化“配角”的尴尬与无奈。程建民、陈勋华君主编的《河源民间歌曲集》的出版，虽在必然之中，却又在意料之外，令我们十分欣喜！集里收录的民歌不仅以其数量上超过了不少流域的客区而引人注目，且以鲜明的地方色彩、多种多样的形式和丰富的内容催人拍手叫好。客家民歌，正是客家文化源流中的一股活水，民歌尚存，说明客脉尚在，说明我们本土的客家文化仍在薪火相传，且积厚流光矣！

是的，虽然我们从心底里热爱自己的本土文化，却又常常身在山中不识宝，我们自己所了解、所掌握的东西多么单薄，多么肤浅！不要小看民歌。民歌是我们的先辈们口头传唱的歌谣，是他们劳动生活的结晶，非学士大夫捻断青丝、搜索枯肠所能尔！民歌真实而不伪饰，自然而不造作，朴素而不失品味，放达而不乏哀婉，无不体现了我们的先辈们的生活场景、人生态度和艺术情趣及其天籁之才，是一种作为本土文化认同标志的精神遗产。我的母亲常常向我们及她的孙辈描绘当年她们上山割草斗歌的情景，有时还情不自禁地亮起她那仍然清爽的歌喉飘出几段美妙的歌子，那份惬意实在令人陶醉和羡慕。民歌是本土文化层岩中最古老的一份遗

产，粘结着人类历史的深厚泥土和尘迹。民歌早于文字，人类一开始运用语言的时候，伴随感情演进就学会了吟唱诗歌的方式，亦即有了民歌的诞生。“在人类最早的文字作品中，我们也可以找到遥远时代里吟唱歌手与讲故事人的口头的痕迹”。盖“歌唱乃说话的延长”，而方言能最准确、最微妙地概括和表达本土居民的生活习惯、心情感受和意味情趣。故作为具有多样性的河源地区客家语言，便足以使河源民歌能够展示多姿多彩的画面。

观照现存的河源民歌，其包容可谓广矣，虽以言情为主，却也不乏道德、宗教、风俗等，糅杂交错，舛互阑干。其思想观念似乎是杂烩式的。然而河源人特别是先辈河源人总是视如家珍，奉为圭臬，他们中的许多人，既是民歌的创作者、歌唱者，又是民歌的欣赏者、传播者，更是民歌的熏陶者。河源民歌的最初拥有者和主要拥有者，是世代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食谷者”，他们在这片算不上丰饶亦不属贫瘠的土地上生存繁衍，他们从光着屁股在泥地里摸爬滚打到生男育女为人父母，荷锄扶犁为农主耕，几乎很少有人有机会跨进学堂的门槛，他们在文盲度极高的环境里靠什么获得礼仪规范和生活愉悦呢？其中就有民歌，而且着实离不开民歌。侧耳而听，民歌是响于冈头，飘于溪尾；深层析之，民歌实乃发于心性，铸于理知也。一代又一代的歌唱者，一代又一代的歌唱接受者，总是在悠悠扬扬的民歌中获得愉悦，同时又在潜移默化中，认知、接受了民歌中蕴涵的朴素的人生哲学和情义真谛。一首首民歌犹如一块块触之无形、感之有存的砖石，成为构筑他们价值观和内心世界的一部分。民歌是他们被哺大成人的文化语境，是他们赖以生存

和发展的精神食粮，岂不贵乎？

《河源民间歌曲集》不仅给我们以欢欣、以自豪，而且给我们以启迪、以昭示：‘任何一种本土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其前提是承传。承传有赖于载体。无论是客家人的土楼民居，还是客家菜系，无一不是在物质实体上表现出来的客家文化的高度浓缩、抽象的符号，此谓物化承传；无论是客家方言，还是客家民歌，或者客家习俗，这些“非物质的遗物”都是客家人文精神的无形载体，此谓灵化承传。承传更是一种文化运动，运动中断就意味着失传，失传就意味着湮灭。时光飞逝，天老地荒，由于古谱失传，今天我们已经听不到真正的“风、雅、颂”，听不到原本的汉魏乐府，也听不到唐宋的法曲仙音了。虽然《敦煌琵琶谱》曾被宣称“破译”而令国人为之一振，可接踵而来的聚讼又令人们陷于困惑和失望。这是文化的遗憾，民族的遗憾，也是世界的遗憾，永远的遗憾。历史是一条长河，文化也是一条长河，没有一滴一珠的流传，一波一浪的迭接，长河又岂能绵绵不绝？故这本民歌集子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使本土民歌免于失传；最大的效应莫过于令我们痛切地感受到承传东江客家文化的一种沉重的历史责任！扪心自问：既然我们客家人是从千年的历史中艰难地走过来的，没有在“大森林的余烬里”消失，没有在“大劫难的废墟中”倒下，也没有在“大战乱的血海上”湮灭，我们又岂能在今天的太平盛世里，让曾经上盈苍苍，下拂漫漫的文化东江顿失滔滔呢？！

毋庸讳言，东江客家文化不无现代社会生活的因素，但她与遥远的历史有着深刻的延续渊源关系，包含世世代代人的文化心理积淀，故迄今为止，她主要还是作为一种传统文

化形态而存在的。而置身现实的我们，于这种源于历史的传统文化之间已经拉开了一定的间距，故本土文化的承传有其艰巨性，需要在挖掘、收集、整理、研究乃至推介上做大量的工作，而不能满足于对着历史深处轻轻松松地作一次远距离的观照就完事。作为当代鲜活的生命存在，我们也不能变成一味逆水而上、回朔源头的鱼，沉迷于某些历史遗物和文化记忆中，或者把文化遗产“等同化石中的古生物”，用昨日的光荣来弥补或拯救今天的窘迫。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从文化承传起步，然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打通，在承传与重建上连结，在现代意识的观照下，通过对本土文化的理性扬弃，最终实现东江客家文化重建和弘扬。也就是说，承传不是“克隆”，重建就是创造。

今天，人类已经进入信息文化时代，人们接受全方位传递的文化，各种文化在萝卜咸菜煮为一锅式的搅拌中互相冲撞而又互相融合。这就使我们面对一个无法回避而又令人头痛的事实：一方面我们要珍惜传统，读解传统，继承传统，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向他种文化寻求沟通，寻求参照系，寻求本土文化的突破和发展。而在各种文化的冲撞与融合过程中，无须掩饰，以现代化大工业和商业为背景的西方文化处于相对强势之态，我们的本土文化处在相对弱势之中，在这种你强我弱的情况下，如何保持本土文化的积极精神，又实现与他种文化的互补，做到既不失色，又有所创新，不能不说是一个难点，而这个难点又正是我们对本土文化的承传与重建问题一直苦苦思索的基本点。尽管我们对此提出明晰的思路和对策还要有一个过程，需要不断地实践与探索，但有两点我们是坚信不疑的：第一，我们将勇敢地迎接欧风美雨

的挑战，绝不会因惧怕被淹而外在于这场激烈的文化力的较量。我们不能由于自己的封闭、僵化而使丰富多采、源远流长的本土文化而枯竭，我们也不能让本土文化在被他种文化的同化中而失去光芒，以至衰亡，成为毫无生命力的“文化木乃伊”，也就是鲁迅先生早就诅咒过的那种专供外国人猎奇观赏的“国粹”。第二，具有本土文化特质的河源东江客家文化，将通过对传统的继承和更新，对他种文化（这里主要是指外来文化）的选择和吸取，与当代社会生活不相适应甚至相抵牾的东西将被扬弃和改铸，富有价值的东西将得到保持、丰富和发扬，最终实现承传与重建的目标。

· 二十世纪的晚钟已经敲响，新世纪的地平线已清晰可见，这意味着我们将拥有更加壮丽的日出和更加灿烂的前景，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完成或实现了跨越。新旧世纪的交替，对我们的东江客家文化而言，意味着一次艰巨的挖掘，一场伟大的整合，一种辉煌的升华。这是难得的历史机缘，更是光荣无比的使命。关键是我们要有强烈的文化意识、历史责任感和激情。不能浑浑噩噩，也不能懒懒散散，否则，我们只会留下“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式的遗憾和哀叹。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领导者对东江客家文化的弘扬表现出一种高度热情与卓越眼光，承传和重建东江客家文化的问题已经被郑重其事地列进“红头文件”与长远规划，而为我们所瞩目的《河源民间歌曲集》，正是在市委主要领导者的亲自关怀下得以出版的。或许，这还谈不上是大举，但此事却精微地、确凿地传递来自于河源大地深处的一种信息：看似阒寂的山山水水，正在酝酿着一股文化复兴的热流，终究有一天，这里作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一脉

的具有雄浑深厚的本土文化底气将为新世纪的朝阳所点燃，而熊熊烈烈，而大放光芒！

这一天真令人心驰魄荡，万分憧憬。

我们应该为这一天的到来而热情燃烧，奉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写于 1997 年 7 月 20 日

为河源美好的明天而歌

——写在《河源民间歌曲集》付梓的时候

程建民

《河源民间歌曲集》就要出版了，这是我们河源市文化界，尤其音乐界值得高兴的事。这是一部收编 200 多首收藏达数十年之久的，具有高度鉴赏价值的民间音乐史料，是河源人民世代辛勤劳动中创造出来的一种地方文化精华。

河源市是客家人主要聚居地之一，全市 260 万人中，客家人占 99%。历史上，这里的客家先民自中原几经辗转流徙至此，成为中华民族的一支重要民系。

河源客家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祖辈当中那些南下的书香门第和名门望族，承传着中原汉族文化，为生存发展与自然斗争和客土杂居的文化交往中，不断结合、融汇乃至变易和发展，使之千百年后的今天依然保存着汉族传统的遗风，又具浓郁的岭南客家山区特色。在这诸多的文化瑰宝中，河源民歌便是其一。它源于中原，变易发展于斯，在不断自我完善同时，又不断促进社会文明的发展。因此它既是客家文化大观园中重要一隅，又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重要构成部分。

出于山水情缘，河源民歌数量之多，堪为岭南之冠。其

代表歌腔就有河源山歌、黄村山歌、黄村捕鸟调、读书腔、船圹山歌、顺天山歌、康禾叠字山歌、和平山歌以及连平山歌、紫金义容山歌、龙川亚顶山歌、马灯调、东江劳动号子等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高吭而辽远，缠绵而委婉，熔山水人情一炉，合叙事抒情一腔，感情朴实，真切动人，散发着阵阵泥土芳香。它和赣南、闽南、粤北、粤东等各地客家民歌一样，既继承了古代诗经、民歌竹枝词和唐宋格律诗的艺术表现手法，又吸收融合了岭南百越民族的丰富唱腔，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是河源人民口头创作和智慧结晶。半个多世纪来，在各个时期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它和其它文艺形式一样，得到很大发展。随着专业、业余文艺团体的兴起，山歌、花朝剧团的建立，河源民间音乐的挖掘整理以及改编应用，均取得了可喜成果。其间产生了不少人们喜闻乐唱的新民歌和新唱腔，也培养了不少颇有名气的民歌手、演员和作曲家。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紫金著名歌手温月英，就以一首《共产党来恩情长》婉转优美而又深情的歌声跨过长江，唱入京城；河源山歌剧团演员张桂娣一首《唱支山歌赞英雄》（程建民作词编曲），博得当时中南五省省委书记赵紫阳、韦国清、张平化、张体学等上千观众如雷掌声，三请其歌。继之徐东蔚、黄光华、周锦清也囊装本地民歌飞入京都，声（名）传华夏。至于那些在本地民歌民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得到周恩来总理关怀过的紫金花朝戏《苏丹》，录音远播东南亚的河源山歌剧《拉郎配》等等，亦是妇孺皆知。进入开放改革时期，新老文艺工作者在邓小平文艺思想指引下，在市场经济、现代生活激发下，对老祖宗留下这些丰富文化遗产，不断发扬光大、创新和发展。诞生于九连山

下的连平歌舞团，在团长黄希南带领下，经风历雨，几易番号，最后还是靠“呵嗨一声云雾开，一支山歌出崖来”，迎着一路鲜花步上一个新的艺术峰峦；从山沟唱到城市，从牛背唱到舞台的民歌手古东权，在开放改革浪潮冲击大地激起上层建筑文化艺术嬗变中，坚定不移地朝着永远做一个人民歌手目标前进，以一首首民歌博得听众喜爱，登上一个个艺术台阶；青年作曲家周晓远、陈晓敏哼着河源民歌长大，划着民族音符成名……无数事实证明，民歌是音乐艺术发展的基础，是音乐创作的胎母、源泉；河源民歌则是我们乡土音乐家产生、成长的土壤和摇篮。只有根植于它，才能创作出独具特色和风格的作品，只有依附于它，我们的艺术作品才能为大众所接受。正如加里宁所说：“只有和民间创作接近，只有向民间创作的源泉学习，才能使最有秉赋的诗人与作曲家在自己的创作中成为天才。”然而，由于开放改革前进中一些负面影响，却出现一些丢宗忘祖现象，诸如心目中只有外国的月亮圆，喉咙里只有别人的烧酒浓，鄙夷“下里巴人”，嫌弃本地姜等等，一味追求摇滚乐中的喧嚣骚动，一味崇尚流行歌曲中那盲目的自我宣泄，抑或过分追求洋歌洋曲那样的表现技巧，慢慢地脱离现实，脱离民族民众，脱离赖以生存的一方水土，甚至陷入难于自拔的茫茫沼泽，在醉眼朦胧中还误以为已经步入艳艳天国，是可悲而实可悲哉！

马思聪，我们的邻居海丰县人。他的名字和他的著名小提琴协奏曲《牧歌》一起占据着我们几代乐人的心，尤其以人们熟悉的客家民歌“粤北春牛调”这一主旋律，把我们这些客家人的思绪带进那深沉岱绿的南岭山区，令人倍感亲

切，永不忘怀。然而他作为一个世界闻名的音乐巨星，由于“文革”罪过，流落于美利坚那异国他乡，尽管生活窘困潦倒，却依然坚持踏着自己民族民风的音符前行，而决不为美元洋酒改行他就。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李政道博士说：“一个数典忘祖的人，决不可能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前者在感受中坚持实践，后者在实践中谈出感受，可谓“智者之见略同”。鉴于目前民歌地盘缩小，不少音乐工作者和听众，在冷静反思中感同身受地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指挥家秋里就是其中代表之一。他说：“我们应发展自己的民族音乐。民族音乐在任何时候都是我国的音乐立足点。如果不搞自己的民族音乐，我们在国际上就立不住脚。”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一脉的河源民歌倘若视而不顾，拒以继承，我们的地方音乐工作者和他的作品，也势必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发展客家文化也便成了一句空话。交响乐、芭蕾舞虽然堪称“阳春白雪”，流行歌曲、摇滚乐也并非绝无可取之处，但它们毕竟是“外来物”、“舶来品”，我们可鉴可学。只是如果一味输入、照搬，不搞自己的东西，不结合实际发展民族民间音乐，象中医大夫去当西医生一样，跟着别人屁股跑，那是永远难有作为的。我们的《阿细跳月》、《乌苏里船歌》所以能在菲律宾举行的第二届国际合唱节引起轰动，正因为它是中国的民歌。第十二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演出的大型歌舞《客家春秋》（陈勋华等编曲）之所以打动人心，从心底深处勾起来自五大洲的客家裔孙们悠悠思乡念祖之情，达到增强这些炎黄子孙对祖国的向心力、凝聚力；最近访台演出的梅州山歌团之所以受到全台 400 万客家人热烈欢迎，拍手叫好，也不外乎它是客家文化的源头

水，故乡里的园中菜。古东权演唱的《处处无家处处家》（金贝词）之所以获得“全国建设之光”文艺晚会一等奖，黄希南挖掘、创作的《竹山欢歌》之所以受到肯定和赞誉，也无非是他们“对客家风俗文化艺术的痴情和迷恋”，“深入客家人文历史和风土人情”，“拜‘下里巴人’为师”的结果。

一位名叫黄绮淑的人在�他的《海外华人话祖国》一文中感慨万端地说：“中国文化内容丰富，海外华裔拿它写成英文小说，成为英美畅销书；可神圣的祖国大地上却有人不重视以中国文化为原料来制作文艺产品，实在可惜！”这完全是他作为炎黄子孙，在踏遍世界各国，饱览各民族文化之余，发自内心的感受。一位泰华报人在观看了以湖北民歌为素材创作的著名歌剧《洪湖赤卫队》后，兴奋之余抱着殷切期望神情说：“应当把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宝贵遗产，发扬光大，不能把这个广阔的领域越缩越小，尤其在当前情况下，更有必要加倍重视。”情真意切的话语说出了国人的心声，道出了民族自尊、自爱、自重的真谛。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角度都不难理解。有人说民歌是“八月黄瓜秋后扇”，过时了；也有人说在一番现代节奏敲击下，竞争激烈的现代生活令人焦躁不宁，由钢筋水泥架构的都市空间，喧嚣骚动，冷漠无情，民歌民谣的复苏，那清新的带着田园诗意的韵律飘进了大都市的上空，抚慰着现代人渴求回归自然追求平和宁静的心灵世界，又增添了都市悠然轻松、飘逸酣畅的气氛。谁是谁非，只有付诸实践去衡量，去检验。笔者是持后一观点的。何况广阔的乡村中还存在“身在乡村乐趣多，出门爬坡唱山歌，唯是工余饭饱后，躺在床上睡不着”的客